

党的创立时期



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宣告成立。经过一年实践,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又经过一年实践,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与组织形式,在更完整的意义上完成了党的创建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环境与条件: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要改变长期贫穷落后的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座大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成为中国迫切的革命任务。第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79年里,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最著名的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辛亥革命。但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二是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这证明: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新兴的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第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1912年全国产业工人有60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黄金时代”,工人阶级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全国产业工人发展到200万左右。中国工人阶级,除具有各国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外,还有其特殊的优点。这些特点决定中国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第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新觉悟,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第五,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序幕;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的登上政治舞台,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是党的产生阶段,中心是创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春,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建立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0年8月,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共党的早期组织。此后,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党的早期组织相继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步成果,为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史称“南陈北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了党的最早刊物《共产党》月刊;帮助指导各地建党;最早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发起召开中共一大,实际上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它从更完整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显著标志。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新型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最初的战略构想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方向虽然正确,但对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缺乏正确认识。为了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斗争纲领和现时目标,党需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策略等问题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总结。

第二阶段,从1921年8月至1923年12月,是党的初步发展阶段,中心是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同时集中领导工人运动。党成立后,在工人运动、宣传教育、党团组织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通过斗争实践,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1922

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这是党在政治上和战略策略上的一大进步,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方向。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出现的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表明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得到空前发展。但是,工人运动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二七斗争的教训是: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能胜利的,使党进一步提高了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转变了政策。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政策,为国共合作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中共二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序幕。党在一大前后,为促进革命统一战线和广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作了很大的努力,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终于在1924年1月促成了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建党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尽管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斗争经验,初创时期的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斗争方向是正确的,意志是坚定的,成绩是显著的,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并为第一次大革命作了纲领上、策略上、组织上的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联合贫苦农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一次武装革命。因其发生在1917年俄历10月,故名。

20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不矛盾化,革命形势日趋成熟。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1917年4月初,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并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的

工人、农民和士兵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并领导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了四月示威、六月示威和七月示威。七月示威遭到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布尔什维克党被迫转入地下。列宁也因遭到通缉而被流放到芬兰。11月代表苏维埃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所控制，变成临时政府的工具。至此，全部政权都操纵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七月示威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9至10月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又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手里，革命形势完全成熟。10月7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日，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中央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16日，在党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成立了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5人组成的军事革命总部，直接领导起义工作。1917年10月24日晚，列宁从秘密住所来到起义总指挥斯莫尔尼宫领导起义。25日（公历11月7日），十月革命正式爆发。彼得格勒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首都的各重要据点，并于次日凌晨攻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临时政府总理兼俄军总司令克伦斯基，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往首都。25日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已转到苏维埃手里。26日，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并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向全国胜利进军，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来。至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获得成功。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仅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十月革命则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剥削阶级，因而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

军。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因而它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使他们的革命斗争有了行动的指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立即出现了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18年初，芬兰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成立了人民代表苏维埃。同年11月，德、奥爆发革命，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制。1919年3月，匈牙利无产阶级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同年4月，德国巴伐利亚省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英、美、法、意等国无产阶级罢工运动和其他革命斗争，日益高涨。在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朝鲜、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民经历了几十年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但始终未能找到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即无产阶级在其政党的领导下，推翻剥削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有片断的、零星的介绍，但其社会影响还很小。“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学习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研究，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使中国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从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随后，它创造性地运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已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接触。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是由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译写的英国进化论者赫德所著《社会进化论》前三章。该文刊登在1899年2月至4月英美传教士和一些外国领事、商人成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第121至123期上。最

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国人是梁启超，他撰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颜德之学说》一文发表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第18期上。1906年1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主编的《天义报》第15期至19期，刊载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译文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节译本译文。1912年，施仁深译述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大部分内容，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在燕尘主编的《新世界》上作了连载。总的说来，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还是零星的、片断的。

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传播，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到1919年元旦，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4篇文章。虽然这4篇文章没有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却明确地告诉人们，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十月革命又是同类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联系在一起的，“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而且“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4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真相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1919年4月，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人》的结束部分，并写了按语。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系统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从1919年5月5日开始到11月11日结束，历时6个月，刊载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部译文及其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载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传略及一些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情况。1919年11月，杨匋安在《广东新中华报》发表《马克思主义

——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作了介绍。此外，在孙中山和国民党指导、支持下创办的《建设》和《星期评论》杂志，在“研究系”政客主办的上海《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也发表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力量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活动。1920年前后，陈独秀先后写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则成了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下，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等先进青年，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胡适、张东荪、黄凌霜等鼓吹的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都曾公开把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企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种形势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得不起来同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大论战。通过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第一次理论斗争。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封建的社会制度，打倒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社会才能彻底解决，劳动人民才能真正解放，因而提出了对中国社会问题必须实行“根本解决”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反动统治阶级恐慌起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激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并加以阻挠和禁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起过积极作用的知识分子，公开站到反动统治阶级一边，竭力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第一次大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首先提出了所谓反对空谈主义的口号，认为“空

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其次提出了外来进口主义无用论，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第三，他提出了高谈主义危险论，其危险一是指“假冒牌号的危险”，他认为主张不同社会主义的人“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其危险之二是指宣传过激主义危险，他认为，“主义”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第四，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了。”胡适的最后结论是：“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请你们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美妙。”“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很显然，胡适是在“少谈些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提倡“多研究些问题”的幌子下，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而主张对人力车夫的生计、大总统的权限、妻妾、女子解放等社会问题作一点一滴的改良。

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李大钊于1919年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其反动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公开宣布了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信仰，针对胡适的反动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他首先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谬论，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的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不发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未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

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第二，驳斥了胡适的外来进口主义无用论。他指出：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把这个理想运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际，因此，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主义，我们这也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阶级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食的官僚强盗。第三，驳斥了胡适的高谈主义危险论。针对胡适的“假冒牌号的危险”，他指出：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混乱真也诚然混乱，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停止了我们的主义的宣传。因为有无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研究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针对胡适的“宣传过激主义危险”，他指出：反动派因着“过激”这两个字，很带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乱我们。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第四，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阐述了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必要性和办法。他指出：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这一个具体的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还指出，根本解决的主要手段是阶级斗争，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就得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六、三十七期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两文，继续坚持其改良主义思想。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七期将出版时，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因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未能继续下去。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公开分裂。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中国革命要不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李大钊的结论十分明确，中国革命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这场论战，扩大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福州惨案】五四运动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屠杀中国民的事件。1919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1919年11月间,福州学生为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经常到各商店进行调查,并时常焚毁日货。当时住在福州的日本人,对此极为仇视,一再挑起事端。寻机报复。11月16日,日本人组织的“商品保护队”,持械寻衅,故意与学生发生冲突,结果打伤学生7人,打死1人,并伤市民多人,造成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驻福州的日领事馆,不仅不感凶凶手以谢罪,反而以保护日侨为借口,电请日本政府派海军于10月23日乘日舰横峨峨号在福州海岸游行,进行武力威胁。对此,福州学联通电全国,请求支援。福州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声援“闽案”的爱国运动。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曾先后发出通电,要求各地团体、各地学联,一致声援。在北京:11月29日,5000多学生在大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12月7日,北京学生和爱国商人,在大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撤换驻福州的日本领事,要求日本惩凶、道歉、赔偿死伤赔偿,并要求撤退在华日舰和取消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在上海:11月23日,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各界大会,最后议决提出了由日本政府谢罪、惩办犯罪日人、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等八项要求,并通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其迅速交涉。12月2日,上海76所学校的万余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同日,上海学联联议部作出决定,从3日起罢课4天。在天津:11月24日,天津学联组织各校学生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12月20日,天津各界3万余人在南开操场召开国民大会,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并发表《天津国民大会宣言》,提出了撤换日本领事等六项要求,并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救国图存。除北京、上海、天津外,全国各省许多地区,如济南、南京、长沙、苏州、杭州、开封、广州、南昌、武汉、镇江、昆明等地,都开展了声援“闽案”的爱国正义斗争。

【早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全国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是1907年5月1日由申中铁路的中、俄工人共同发起,在哈尔滨三十六棚总工会举行的。1913年,在南方的广州也举行了庆祝五一纪念日的活动。1918年,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散发过纪念五一节的传单。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刊出了“劳动节纪念专

号”。但所有这些活动的规模都不大,参加的人数也不多。中国工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在1920年5月1日。这一天,全国有七八个城市,约五六万工人参加了这一纪念活动。在上海,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的指导下,5000多工人召开了由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7个团体联合筹备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陈独秀当选为筹备大会顾问。纪念会在军警的干扰破坏下,几易公址,但工人仍坚持开会。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工人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三八制”要求,并高呼“劳工万岁”、“中华工界万岁”等口号。会后,发表了《上海工界宣言》和《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这一天,上海《新青年》杂志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反映工人生活的图片32幅,各类文章20余篇,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劳苦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重要文章。纪念专号还首次刊登了十几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的调查报告。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也刊出了劳动纪念号。在北京,李大钊领导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纪念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在这一天举行了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校内召开了有500多校工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大会,李大钊到会讲了话。何孟雄等8名北京学生还分乘两辆汽车到王府井、骡马市等闹市区游行,并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后被巡警拘捕。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50多人,在这天分成5个组,沿街向市民进行讲演。五一节前夕,长辛店数十名工人开了纪念会,邓中夏在5月1日起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演讲,并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受到了工人欢迎。北京《晨报》、《新社会》等刊物都纷纷刊出了“劳动节纪念号”。在广州,工、学界团体在东山举行了约有5万人参加的庆祝会。此外,唐山、哈尔滨、九江、汕头、漳州等地,也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1921年5月1日,全国许多地方的人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李启汉、李汉俊等率领20多名积极分子,在上海市街头散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传单。湖南劳工会在第一期师范学校举行劳动节游艺会,会后数百名工人、学生又举行游行示威。这是湖南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活动。同日,北京城里散发了《五一劳动节》等传单。高等师范举行讲演大会。长辛店有1000多铁路工人举行五一纪念大会,并宣布成立工会,会后又举行示威游行。唐山、广州等地的工人,也在5月1

日举行了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早期纪念五一节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实践。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一活动,更自觉地投身于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工作,同时转变了他们自身的立场与世界观,从而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第二次理论斗争。

“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于1920年8月以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相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但就在此时,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之间,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1920年9月,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10月,罗素到湖南时,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和胡哲珩、杨端六、李石曾等陪同前往。张东荪回沪后,于11月6日在《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11月7日、8日,陈望道、李达和邵力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分别发表《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张东荪原形》、《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等文章,给张东荪以迎头痛击。当时正在广东的陈独秀,分别给罗素和张东荪写了公开信,对他们的谬论加以驳斥,并将张东荪、李达等人的文章和陈独秀、张东荪之间的信件,汇集在一起,以《社会主义的讨论》为题,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四号上,以便发动人们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批判。1920年12月,张东荪在《改造》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题为《现在与将来》的长篇文章,系统阐述其反社会主义观点。1921年2月,研究系头目梁启超加入这一论战,在《改造》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题为《复张东荪君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篇文章,支持并发挥张东荪的论点,他们鼓吹改良主义,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中国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他们认为,农民太无知识,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变了地主,农民生活虽有变化,然未必甚大;工人道德堕落,终年总业,工人与商人都成为有力的阶级,因

此,现在只能谈到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不会发生真的劳农革命。第二,中国目前约出路,在于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既有贫乏病,则开发实业为唯一之要求。资本主义利在目前而在将来。只有资本主义发展了,才能造成一个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才有所凭借。第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党代表那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高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劳动阶级,除了交通码头因为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多次经验的教训。因此,除了静待以外,无法发展。公开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第四,鼓吹基尔特(即行会)社会主义,主张改良。他们虽然也高谈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但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广。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办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开展研究工作,组织协社(即合作社)等,实行改良政策。

张东荪、梁启超的上述文章发表后,我国早期共产党人,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对他们假社会主义谬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其中,较重要的文章,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九卷一)、《社会主义的商榷》(《共产党》月刊第二期);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九卷三);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之实业》(《曙光》二卷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评论之评论》一卷二)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中国具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条件。他们指出: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因此,革命的爆发乃是必然的。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第二,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不能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他们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主义国经济竞争的重点,足万国大战的战场。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主义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第三,改良主义在中国是不行

通的。他们指出:对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以期唤起其觉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定性植于固。他们觉得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雇工的损失,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第四,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李达指出:俄国的十月革命就采取劳农主义的方式了。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蔡和森更是公开宣布:和森为极端马克思主义,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世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第五,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他们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并正在积极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批判张、梁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同时,明确提出:要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势力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这次论战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论战的实质,就是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次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结束。通过论战,划清了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坚持了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次大论战即将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光荣诞生。在这次论战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即没有正确地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否定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比起争论的焦点来,这个缺点是次要的,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很快就自己克服了,这个缺点。

【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第二次理论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个人绝对自由。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后,便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传开来,持续时间长,影响极大。我国早期

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是刘师复,后期是黄凌波、区声白。五四运动以前,无政府主义在反对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政府主义日益暴露出它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别是在共产小组成立以后,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对青年的影响,已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障碍。因此,共产主义者不能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清除其影响。1919年5月,黄凌波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1920年2月,易家铨在北京无政府主义刊物《奋斗》第二号上发表《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一文,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底以后,区声白曾以通信的方式,三次致信陈独秀,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八卷一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这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的先声。同年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后,先后发表了李达的《社会主义底商榷》(第二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第四号),无解(周佛海)的《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第四号)、《夺取政权》(第五号),C.T.(施存统)的《我们怎么样样社会革命?》(第五号)等专论,并在第一至第五号上发表了具有社论性质的《短言》,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1921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九卷二上发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8月,又在该刊九卷四号上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发表了他和区声白往来的6封信件,继续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此外,1921年1月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自由与秩序》一文,1921年8月蔡和森在《新青年》九卷四号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周恩来在《少年》第二期和第六期上发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失败了!吗?——质工余社三泊君》等文章,也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

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争论之点是:第一,关于自由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宣扬个人万能,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黄凌波认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区声白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承认有所谓社会,更不承认有他人的意见。他们认为一切组织、制度、纪律、法律、集中和领

导等等，都是妨碍自由的东西，都一概反对。而共产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绝对自由”，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也是行不通的。指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割的。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国家，特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宣称：我们并不承认国家的强权，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强权，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强权同个人自由有反对地位，布尔什维克却专事用强权，这是摧残个人，这就是非人道。共产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强权所以可憎，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与压迫者，压迫弱者与正义，是偶然而过，拿他被拥护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压迫，就不见得可憎了。若是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再过一万年，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可能。因此，非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不可。他们公开宣告：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第三，关于生产与分配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托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实行分散生产，反对有计划的大生产；主张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者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生产与分配的“理论”，认为这种主张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完全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衡。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衡，无论何业，非依循中央的权力不可，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归中央管理。指出如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而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就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者在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还对共产主义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对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但实际仍坚持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党有严密的组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他们退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而纯洁和巩固了党

的组织。在此前后，上海、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亦相继退出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者还对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和工人群众，进行了大量的教育争取工作。如湖南劳工会的领袖黄爱、庞人铨，在毛泽东的耐心教育帮助下，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社会青年团。在国外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斗争。著名的共产党人陈延年，就是在留法期间摒弃了无政府主义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持续了1年多。1922年，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罗素白致信陈独秀，表示“幡然有所觉悟”，正式承认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他说：现在已确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对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都起了重要作用。

【沙田惨案】见“香港海员大罢工”。
【陈炯明叛变】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的反动武装叛乱。陈炯明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13年国民党议决失败后下台，亡命海外。1916年1月，在广东东江一带组织革命，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将广东省长公署的20营警卫军（即陈炯明1916年所统率的部队）交给陈炯明，并任其为总司令。同年12月，因北洋军阀派兵从福建进攻广东潮汕，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率部进军福建。经10个月奋战，打败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北洋军，占领闽西南20余县，部队由原来的8000余人发展到2万余人。孙中山把陈炯明视为“可靠资粮”的“革命将领”，把他的率部的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他倾全力装备这支部队，并将国民党中的军事人才，如邓铿、许崇智等派到该部工作，并批准全体官兵晋加入国民党，希望依靠这支部队达到革命的目的。在孙中山的大力培植下，陈炯明成为当时国民党的军事要人。1920年8月12日，在孙中山教唆下，陈炯明在福建漳州誓师回粤，分兵三路进攻桂系军阀岑春煊和陆荣廷。10月29日，攻克广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新组成不承认，又任命陈炯明为军政府陆军部兼内务部长。

1921年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李奉、韩、饒、潘各军事，进攻桂系军阀延部，仅3个月即攻占广西。孙中山在统一广东、广西后，于1922年2月率各军分路出师北伐，试图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以实现民主共和。6月13日，北伐军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江西督军、直系军阀陈炯明亦辞职避匿。但就在此时，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却背叛孙中山，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陈炯明在率领“援闽”粤军回到广州后，即身兼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军政府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4项要职，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大权，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一心想做广东的土皇帝，由“革命将领”蜕变成封建军阀。为保全实力，巩固个人权力和地盘，他高唱“保境安民”，“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在广东组织革命政府，反对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处处阻挠、破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和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阻止孙中山取道惠州北伐，反对孙中山被迫改道江西北伐后，陈又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暗中达成反孙协议，阴谋夹击孙中山督率的北伐军。1922年3月，他派人暗杀了坚决拥护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4月，孙中山两次召陈炯明会晤，面商北伐问题，均遭拒绝，陈还以电辞来兼各职相要挟。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长3职，只保留其陆军部长一职，希望他能幡然醒悟。陈炯明却宣布“遵令辞职”，离开广州赴惠州，并密令在广东的心腹叶举，迅速回师广州。6月14日，陈炯明在石龙扣留廖仲恺，并将其囚禁，同时密令叶举发动武装叛乱。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变，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总府楼。幸孙中山已得消息，在叛军向粤秀楼进军时，间道走出，来到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附近的宝璜艇上避难，其著述手稿和来往函电，均遭毁灭。17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召集舰队官兵，号召讨伐叛逆，并率海军各舰集中黄埔，从水上进攻广州叛军。19日，电令李烈钧、许崇智等人率北伐军，迅速回师广东，镇压叛乱；并派马湘赴香港，筹措粮食、燃料和军费。

陈炯明叛变后，恚20万重负捉拿孙中山，并用鱼雷、大炮猛烈攻击孙中山的座舰，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当其阴谋破产后，陈炯明委托负责广州反任任务的魏邦平等人出调调解，要求“和解”，被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炯明的叛变，激起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义愤。海军全体官兵发出通电，讨伐陈炯明。黄埔附近千余乡

民、组织义勇队，协同海军保卫黄埔。旅居美国、古巴等地的华侨，先后发出通电，声援孙中山讨伐叛逆。陈炯明因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军事上占着优势。在其重金收买下，海圻、海琛、肇和3艘巡洋舰叛逃，使孙中山指挥的海军力量受到重大损失。7月29日，回师广东援助孙中山的北伐军，在韶关被陈炯明部击败，分途退入福建和广西。8月9日，孙中山在指挥军队与陈炯明叛军激战55天之后，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离开广州附近的白鹅潭，经香港赴上海。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自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自己一手组织起来的“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竟然发动叛变，要置他于死地，使他遭到一生中最高沉的打击和最惨痛的时刻。就在他叛变国难，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得到中国共产党、苏俄共产党和列宁的帮助，从而走上了联合、联合、扶助农工的革命道路，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大转变。而陈炯明的叛变，使其在政治上、道义上彻底破产，从此走上败退的道路。1923年1月16日，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逃往惠州，所部叛军三四万人，亦退到东江、潮梅一带。2月，孙中山又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陈炯明的反革命部队被彻底歼灭。此后，陈炯明便蜷居香港，1933年8月病死。

【二七惨案】见“二七大罢工”。

【六一惨案】1923年6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沙枪杀中国民的事件。1923年3月26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租借我国旅顺、大连满期之日。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收回旅顺。日本帝国主义却拒绝归还。北洋军阀政府也无意收回。人民群众对此极为愤慨，因而爆发了全国性的要求“收回旅顺”的反日爱国群众运动。3月29日，在郭亮、夏曦、夏明翰等领导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省教育会和商会等团体，发动6万多人，在长沙举行“收回旅顺”的示威游行大会，并向日本领事馆递交《警告书》，要求还我山河，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手段。为了统一湖南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力量和步伐，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省学联、省教育会和商会四团体，于4月5日发起成立“湖南外交后援会”，郭亮被推举为主席，夏曦、夏明翰、柳直荀等共产党人和一些团员被选入后援会领导机关。湖南外交后援会成立后，创办了《救国周刊》，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回旅顺，废止二十一条，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在后援会领导下，湖南人民结成了强大的反帝爱国阵线。5月7日，后援会领导长沙数万群

众，举行“纪念国耻、废除二十一条”大游行。5月14日，后援会宣布《对日经济绝交公约》细则24条，开展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在日商各行业都设立日货调查员，检查监督《对日经济绝交公约》的执行；宣传队在街头去日货，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在日商行业服务的中国人，一律罢工；商人和一般市民与日本断绝经济往来。对日经济绝交十余日，使日本在湖南的侵略势力遭到严重打击。6月1日，日本轮船武藏丸号运载日货到长沙达金码头，外交后援会的调查员前往进行检查，遭到日本水兵殴打。千余群众聚集码头，与日本水兵对峙。停泊在湘江中的日本军舰上水兵，持枪上岸，开枪行凶，当场打死2人，重伤9人，轻伤数十人，造成“六一惨案”。惨案发生的当天，外交后援会在省教育会召开有2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提出了解决惨案的八项条件：（一）撤换日本奸细湘领事；（二）罢办日本军官；（三）惩办凶手；（四）撤退日本一切驻湘军队；（五）收回日本在湖南占用的一切码头；（六）责令日本驻湘领事公开向人民道歉；（七）抚恤死者；（八）赔偿伤亡保险费及医药费。会后，抬尸游行，向省长赵恒惕请愿。6月2日，后援会又在教育会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罢工、罢课、罢市，并再次抬尸游行，敦促赵恒惕政府与日方交涉。6月4日，后援会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并再次率领群众队伍到省长公署请愿。愤怒的群众将火车站中的600余箱日本漂白粉倒进湘江，把日本在长沙城的侨商统统向日轮口脱，不许上岸；对停泊在湘江的日轮，禁止供应大米和蔬菜。惨案发生之初，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赵恒惕政府曾向日本领事进行过交涉，提出了解决惨案的五项条件，被日方拒绝。后来，赵恒惕完全倒向日本一边，并和日本领事做秘密交易：日本卖给他一批军火，他卖给日本一批大米的利益。6月8日，赵恒惕派兵武力解散湖南外交后援会，并通缉郭亮、夏曦、夏明翰等后援会负责人。赵恒惕用武力镇压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曹锟贿选】北洋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收买国会议员的办法，于1923年10月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事件，史称“曹锟贿选”。曹锟于1919年冯国璋死后，成为直系军阀首领，任直鲁豫皖巡使。1920年7月，在奉系军阀张作霖配合下，发动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段祺瑞，任奉系军阀总控制北洋军阀政府。1922年4月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直系独霸北京政权后，为稳固其统治，于

1922年6月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把黎元洪拉出来复任大总统；并恢复早在民国六年（1917年）就已解散了的旧国会，搞所谓“法统重光”的政治骗局。一年后，当直系认为统治已经稳固，便策划踢开傀儡黎元洪，由曹锟直接上台。1923年6月6日，直系军阀迫使国务总理靳云鹏辞职，使政府陷于瘫痪；同时反交总统黎元洪干涉内阁职权，破坏责任内阁制。7日，指使北京军警包围数百人，向黎元洪索贿请愿。10日，又雇用流氓和出动便衣军警，打着所谓“国民代表”、“市民请愿团”等招牌，开会游行，围困黎元洪住所。6月13日，黎元洪被迫离京赴天津。但到天津车站后，又被曹锟派信，直隶省长王承斌派兵包围，勒令其交出总统印信。黎元洪被迫辞职。黎元洪的下台，为曹锟上台扫清了道路。为了登上总统宝座，曹锟采用高价收买和武力胁迫的办法来“选”自己当总统。他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作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用“出席费”、“酬劳费”、“津贴”等各种名目贿赂国会议员，以至用5000元一桌的高价收买议员，答应选前发给支票，选后兑现。10月5日是选举日，曹锟出动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同时派出大批汽车四处奔驶，拉拢议员，众、参两院议员共593人参加总统选举会。曹锟以480票“当选”。10日，曹锟由保定至北京，就任“总统”。同日，颁布了一部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企图用以掩饰其贿选罪行。曹锟终于用1350余万元的巨额贿款，买得了“总统”的宝座。曹锟的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的人们把这届国会称为“猪仔国会”，把受贿议员称为“猪仔议员”，把曹锟叫做“贿选总统”，把这部宪法斥之为“贿选宪法”或“曹锟宪法”。曹锟贿选为总统后，在广州的孙中山曾于10月8日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团，否认曹锟为总统。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反对直系军阀媚外卖国、残暴统治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猛烈冲击着北洋军阀的统治。1924年10月23日，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从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布辞职，并被禁于中南海延庆楼。曹锟只当了二年零十几天的短命总统，便被历史所淘汰。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924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酝酿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

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

问题理论指导下,经过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帮助进行的。早在1920年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首席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通过与孙中山会谈和在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认为国民党是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并提出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被共产国际所采纳。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提出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通过这次大会,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了解和接受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同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在广州会谈。孙中山拒绝了达林提出的建立国共两党“党外联合”的建议。1923年1月,苏俄外交部部长越飞到达上海,同孙中山多次会谈,发表了《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进一步确立了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共产国际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5月作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1月28日又作出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上述决议和指示,对中国共产党确立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对国民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斗争实践,很快认识到,无产阶级目前应联合民主派共同进行民主革命。1922年4月,最早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去做”的思想: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5月,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和口号。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建

立“民革联合战线”的方针。8月23日,中共派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8月28—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促进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形式问题上由“党外联合”到“党内合作”的重大改变。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张国焘、蔡和森等先后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正式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同时指出要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12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1922年9月至1924年1月,进行了改组国民党的各项工作。1922年9月至12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3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的筹备会议。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沿路苏联援助问题。10月,孙中山召开特别会议,聘请苏联政府常驻广州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具体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并指派廖仲恺、谭平山等9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在改组国民党过程中,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力排各种阻力与干扰,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出席大会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和起草文件工作。大会通过了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

民主义,接纳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选举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共合作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迅速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新高潮,出现了五卅运动、香港大罢工、北伐战争、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运动等空前壮举的革命事件;中共党员由400多人猛增到1927年5月的57900多人。国民党也在组织、纪律等各方面获得显著的进步,恢复了生机。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到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和陈独秀右倾妥协错误的领导,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是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所面临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国共两党得以合作的政治基础。在国民党方面,其成分复杂,组织松懈,纪律涣散,内外政策接连遭到失败;孙中山正确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心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和方法,恢复国民党以前的革命精神,使之成为一个团结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而恰在这时,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由于组织刚刚成立,人数很少,政治影响尚小,又不能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必须举起与国民党合作的旗帜,以便发展工农运动,壮大自身与革命的力量。因此,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双方的共同努力,于1924年1月正式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运 动 · 罢 工

【早期的中国工人运动】 1919年六三运动前处于自在阶级状况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自发性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而产生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清朝政府开始创办军事工业，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也开始转向新式工业，创办了一批资本主义企业，这又产生了中国的另一批产业工人。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产业工人的总数已达到100万人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便已达到200万人左右。200万产业工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除具有各国无产阶级一般的特点，即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之外，还有其特殊之点：第一，同全国其他阶级相比，工人阶级高度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少数大城市和铁路、矿山、海运、纺织等大型企业中，这有利于整个阶级的团结战斗，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二，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三重压迫，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比其他其他的阶级更加坚决彻底。第三，中国的工人多半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在革命斗争中容易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因此，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为反对外国压迫者、剥削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英勇斗争。1858年，为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香港的2万多市工、搬运工人举行罢工，并撤回广州。这是中国工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斗争。1885年，香港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给法国修理军舰，反对法国侵略中国。1903年，蒙自铜矿1万多名工人参加了云南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临安起义。

1905年，上海启新纱厂4000多工人，为反对工头的额外剥削，捣毁了工厂的门窗和机器设备。1906年，安源煤矿6000多工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发动的武装起义。1911年，川汉、粤汉铁路工人，参加了四川等地资产阶级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保路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1870年至1913年的43年中，全国工人发生过130多次罢工。在1914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5年多时间里，全国工人自发的斗争更加高涨，罢工达10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罢工有：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大轮船公司的船员罢工；上海泥水木等业工人的罢工。1915年，湖北大冶铁矿工人、苏州机械业工人、上海人力车夫、安源煤矿工人先后举行罢工。1916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上海翻砂工人、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工人、江南造船厂工人、天津法租界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其中，天津法租界1700多工人反对法帝国主义掠夺老西开地方的罢工，具有鲜明的反帝斗争性质，最后迫使法帝国主义放弃了把老西开划入法租界的企图；江南造船厂1000多工人的罢工，具有鲜明的反对封建统治的性质，最后迫使北洋政府江南造船厂总办刘冠雄宣布取消搜身制度，并查办毒打工人的凶手。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工人、湖南水口山矿工人、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工人先后举行罢工。1918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上海第二纱厂工人、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工人、大连沙河铁道工厂工人先后举行罢工。1919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工人、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印刷车间工人先后举行罢工。

这些罢工，大都是由于工人不能忍受残酷的剥削虐待，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待遇而自发进行的经济斗争。当时领导和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也是一些旧式的民间秘密结社，（如寿老会、老君会、三合会等）、行会（如木工的鲁班会等）和由同乡关系组成的一些帮口（如宁波帮、湖北帮等）。这些组织虽然在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中起过一些作用，但它们不可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不可能使工人阶级真正获得解放。这一时期罢工斗争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工人罢

工斗争的次数明显增加，有的还进行了连续的斗争，如1914年至1916年，仅上海罢工多达85次；1916年到1919年间，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工人、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大连沙河铁道工厂工人也曾连续举行过罢工。第二，工人在斗争中已开始意识到“共同反抗”的意义，人数众多的同盟性罢工日益增加。如1915年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参加者达2万多人；1919年上海三新纱厂工人罢工，参加者达8000多人。第三，开始出现政治性的罢工斗争。如1915年，上海搬运工人和在日本企业中做工的中国工人，为反对美国的二十一条举行的罢工；天津法租界工人在1916年举行的反对法国企图把老西开的斗争等。总之，这时的罢工斗争，主要是经济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为数还极少。这说明中国的工人阶级还处在“自在”的阶段，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这时的罢工斗争虽然绝大部分都遭到失败，取得胜利的极少，但它仍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发生的反对封建思想的启蒙运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到20世纪初，一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继续强烈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又掀起了反对封建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为起点和中心阵地，高举了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这个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与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

告青年》一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与科学。他指出：民主（当时称为“人权”）就是每个人都“各有独立之权”；“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退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勇猛地向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倡导者李大钊，也相继发表文章，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他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指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曾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礼教者文（礼教）与礼教”，猛烈抨击封建宗法制度，高喊“我们不是为礼主而生的！不足为圣贤而生的！也不足为刑赏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被称为“只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从而揭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学，并把文学革命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他提出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即：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8年5月，鲁迅发表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树立了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开拓了中国新文学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尽管未能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没有给人指出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但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原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创办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

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习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友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些社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起过重要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足见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革命运动。它既是一次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五四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背景是山东问题。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并把山东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914年11月，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借口对德国宣战，派兵占领青岛和济铁路沿线，控制了山东。1915年1月，日本又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在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中，要中国政府同意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并要中国政府允诺不把山东的土地及岛屿让给或借给其他国家，同时开放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能由此收回山东的主权。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曾对德宣战，因此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陆征祥（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等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7项希望条件：（一）废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撤换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归还关税自主权。后来，在中国留欧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中国代表团又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又要求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

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特权。和会战前会议拒绝了中国的这些正当要求。与此同时，美、英、法三国和日本勾结在一起，在拟定《巴黎和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条款时规定：“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定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大胶州湾、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上德国直接或间接担负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德国应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裁判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有放何处，自本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这就把德国在我国山东强占去的胶州租借地、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了日本。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举国愤怒。5月3日晚，国民革命军、新潮社、北大平民教育讲习团等社团的成员，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主持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其他各校也有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法政专门学校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并由北京大学学生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巡捕的阻拦后，又转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和谈判代表之一，当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他和当时的驻日公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是爱国学生一致要求惩办的3个卖国贼。学生的游行队伍冲进曹宅，曹汝霖已闻讯躲藏起来，正在曹宅的曹汝霖遭到痛击。曹宅亦被学生放火焚烧。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捕去学生32人。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实行总罢课，并要求北京政府释放学生，严惩国贼，不承认“二十一条”，不得在和约上签字。5月6日，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像春雷一样震动了全国。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南昌、广州、成都、西安、昆明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

上,纷纷发出通电,举行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日本、法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南洋的华侨学生也都开展了爱国活动。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又反过来支持和鼓舞了北京学生的革命热情。5月7日,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学生们开始复课。但他们所要求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因此斗争并没有平息。5月19日,北京大中小学的2.5万多名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闹饭维持会、护费义勇队,继续进行斗争,同时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800多名在街头讲演的学生。由于监狱容纳不下,北京大学的校舍也成了军阀政府设立的“临时监狱”。持续两天的逮捕,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爆发了。6月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10日,罢工达到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六七万人;与此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给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到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此,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开始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6月6、7两日,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10日,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3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获得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已经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等,他们在各地的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他们是五四运动中的右翼,不是运动的领导者。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作为爱国政治运动,从1919年5月4日开始,到6月28日拒绝《和约》签字为止,便胜利地告一段落。作为新文化运动,则可以以1915年《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创刊算起,直到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告一段落。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猛烈进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十月革命后,又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六三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政治罢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新阶段。1919年5月4日,3000多名北京学生集会游行,反对签订《巴黎和约》,反对帝国主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和罢课,予以声援。北京学生则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斗争,先后于5月5日和19日举行了两次总罢课。6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在北京街头进行讲演的178名学生;4日,又逮捕700多人。对爱国学生持续两天的逮捕,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广大工人阶级立即投入战斗,掀起了第一次政治大罢工。这次政治大罢工首先从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开始。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人民立即响应,掀起了爱国运动的浪潮。5月26日,上海学生实现了总罢课。在学生的推动和促进下,上海商界也于6月5日实现了总罢市。当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后,许多工厂的工人纷纷自动罢工。6月5日上午,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的五六千工人,实行全体罢工;下午,日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也相继罢工。同一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和码头工人,以及沪宁、杭甬铁路的部分工人,也开始罢工。这样,上海便于6月5日实现了“三罢”。整个上海,生产瘫痪,商业停顿,交通断绝,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打击。从6月6日起,各行各业工人都相继罢工。6月10日,罢工达到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六七万人。6月12日,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3人的消息得到证

实后,上海才结束“三罢”斗争,商人开工,学生开课,工人开工。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到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长沙、天津、唐山、天津、杭州、广州、九江、长沙、武汉、南京、济南、青岛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和其他各种爱国活动。在工人罢工的同时,许多地方的学生和商人也举行了罢课和罢市。至此,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主力由青年学生转变成工人阶级;运动的性质,也由开始时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性质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从而为五四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便更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终于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6、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10日,又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3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之日,在旅法工人和学生的英勇斗争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终于没敢赴会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在六三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出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打击,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六三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到法国勤工俭学,向西方寻找国家、民族及个人出路运动,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于1912年,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留学生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等几个阶段的发展,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形成一个空前规模的热潮。“勤工俭学”,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之意,即以自己做工所得收入,作为入校学习的费用。当时留法的学生,包括留官、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按其历史的发展,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19年以前,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初期或准备阶段。其倡导者,主要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希望动员有志求学的青年,到法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输入西方文明,代替中国落后的封建文化,实行“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运动,在当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为了

推动中国学生赴法国留学。1912年初,由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同年4月,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他们又在京大方家胡同建立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留法俭学会成立后不久,吴玉章和朱范恒、黄赞生等发起成立了四川俭学会,并在成都少城街公学设立留法预备学校。留法俭学会,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建立最早的一个组织。其宗旨是: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从1912年初到1913年秋的一年多时间里,留法俭学会先后组织了160余人赴法留学,超过以往十年官费留法学生的总数。但俭学会仍需相当的费用,对一般青年还是无法实现的。1913年秋,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因遭袁世凯反动政权的迫害流亡国外,留法俭学会也因此而停止了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约有10万华工到法国做战争勤务工作。当时正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积极在华工中开展教育工作,并于1915年6月,支持李石曾等在巴黎开设的中国豆腐公司的华工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组织了勤工俭学会。该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勤工俭学”一词自此而始。它为国内更多青年赴法留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16年3月29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和法国的欧乐、穆梭、宜士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6月22日,在巴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欧乐当选为会长,李石曾、李圣章和覃纳、法露为书记,吴玉章、宜士为会计。该会的宗旨是:发展中英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及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出版中文书籍、报纸,介绍学生留法,组织华工教育,联络法中学者为团体,帮助法人游学中国等。该会已成为当时中法两国在教育文化方面交往的总机关。华法教育会成立后不久,便同勤工俭学会在巴黎创办了第一所华工学校。此外,还开办了翻译讲习班、华工夜校和华工俱乐部等。1916年8月,又在法国都尔创办了由蔡元培、李石曾等担任主编的《旅欧杂志》,该刊直到1918年3月才停刊,在当时的华工和旅法学生中有较大影响。1917年初,蔡元培、吴玉章等为法国回国,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此外,还在河北藁城县布市村(今属高阳县)、保定、北京、长辛店、成都、重庆、上海、广州、长沙、济南、天津、武汉等地,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或各种形式的留法预备班;在上

海、四川、广东、江西等省市建立了华法教育会的分会,负责宣传和组织本地地区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但在五四运动以前,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还不足200人,其规模和影响都还不大。

1919年以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第二阶段。在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至1920年间达到空前的高潮。他们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单纯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希望借助于这一运动,学习新思潮,学习西欧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培养革命人才,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救世良方。从1919年3月17日首批中国勤工俭学生赴法,到1921年1月20日最后一批抵达马赛,前后共有17届来自全国18个省的1600多名勤工俭学生,分20批先后到达法国。其中,以湖南、四川两省人数最多,各有300多人。留法勤工俭学生以中学生为最多,也有小学、师范、大专院校的学生和从日本、南洋转来的留学生;还有少数教师、新闻记者、工人、商人、职员、医生等;还有一批女生,如向警予、蔡畅、郭隆真、刘清扬等,共约40余人。留法勤工俭学生到达法国后,有的进工厂,有的人学学校,也还有一些候工者。做工的分布在法国各地的70多家工厂企业中,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巴黎、克鲁布、圣德田、圣夏门、勒加佛尔等;读书的则分布在巴黎和外省的26所学校中,其中以蒙达尼学校、枫丹白露学校、慕瓦中学、杜鲁公学等为最多。他们一边从事艰苦的劳动,一边勤奋学习。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批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他们到法国后又组织了一些革命团体,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开展革命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以蔡和森为首的旅法新民学会,以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等为首的工学界社,以李立三、赵世炎、王若飞等为首的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生会。这些社团的建立,对领导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开展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中共旅欧党团的建立从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留法勤工俭学生在1921年开展了二次大规模的革命斗争。第一次是1921年2月28日,在蔡和森、李维汉等领导下,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校”而开展的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请愿示威的三二八运动。第二次是同年6月30日和8月13日,在周恩来、袁子才、刘清扬、徐特立等领导下,两次举行“拒款大会”,开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秘密借款的斗争。第一次是1921年九十月间,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李维汉等领导

下,为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取得求学校而开展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这3次大规模的斗争,不仅震动了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的统治者,而且也提高了勤工俭学生的政治觉悟,使留法勤工俭学生开展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留法勤工俭学生并不都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存在着各种信仰,各种思潮,相互间斗争很激烈。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首先开展建党活动的,当推蔡和森。1920年7月,他提出组织共产党的主张;随后,又向毛泽东详谈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事;1921年4月和7月,又两次提出成立“少年共产党”的倡议。1921年4月,在国内已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和在法国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刘清扬、周恩来组建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6月,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人的组织下,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秋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旅欧共青团和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先后创办了《少年》、《赤光》等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领导勤工俭学生和旅欧华人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派、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驻欧支部(后改称驻法总支部),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等斗争;输送大批党员赴苏联学习,培养革命干部。

到1926年底,留在西欧的勤工俭学生已经不多见了。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考上了官费生,一些人因生活无着而归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便就此宣告结束。勤工俭学生中的党员们,也因赴苏学习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而大量减少,他们便在德共法和法中创立了“中国语言组”,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的历史便告结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有两大重要成果:一是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对旧中国的实业发展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产生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的建党建团活动,有过重要影响,并造就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向警予、徐特立、李立三、蔡畅、李维汉等一批批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

【驱张运动】湖南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于1919年12月到1920年6月开展

的驱张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政治运动。张敬尧，安徽霍山人，历任北洋军第七师师长、苏鲁皖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等职。1918年3月，直皖联军击败直系军阀，张敬尧率部入湘，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在督湘期间，他纵兵烧杀抢掠，搜刮民脂民膏，钳制舆论，摧残教育，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919年8月，张敬尧禁止爱国运动，强行解散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并查封了《湘江评论》，9月，毛泽东以省学联为基础，联络教育、新闻界人士，秘密开展驱张活动。同时派彭璜等人到上海，易礼容等到武汉，同全国学联等团体取得联系，进行反张宣传。11月16日，省学联重新恢复，法政专门学校代表徐庆普为会长，第一师范代表、新民学会会员张国强等为副会长。12月2日，长沙的学生、教职员和市民等共约万人，在省教育会坪举行焚烧口供大会。张敬尧派兵镇压，捕5人，伤10余人，余众数千人被强制解散。这一事件，成为爆发驱张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和省学联负责人及部分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决定实行总罢课，把驱张运动推向高潮。6日，第一师范、商专、楚怡、周南等校首先实现罢课。不到一星期，长沙全部专科学校、中学、师范和部分小学，实现了总罢课。省学联代表长沙中学以上学校的1.3万多名学生，向全国发表罢课宣言，宣布：“张敬尧一日不去湘，罢课一日不回校，时日易变，誓与偕亡！明知此为极大牺牲，为前此之所未有，亦实因张氏罪恶大急极，浮于中外古今。”实现了全体学生的大张快斗。接着，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也实现了总罢教。总罢课实现后，又采取了更强大的措施，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以及衡阳、常德、郴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直系两系的矛盾和张敬尧与湘军的矛盾，争取直系吴佩孚、冯玉祥及湘军谭延闿、赵恒惕等在军事上压迫张敬尧。同时，还组织“驻省驱张团”，驻防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各界人士坚持省内驱张运动，并负责和外地各代表团的联络。12月7日，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分批离开长沙到武汉集中；18日，到达北京。该代表团由学生代表、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组成，共30余人。其中，新民学会会员陈昭博、李思安、符竹如、张怀、罗宗瀚、张宝桐等，该代表团在武汉停留期间，发表了由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李季汉、徐庆普等55人署名的《快邮代电》，历数张敬尧

之祸湘罪行。到京后，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为驱张机关，成立了“平民通信社”，由毛泽东任社长，向全国各报刊发稿，揭露张敬尧罪行，报导各地驱张运动消息，造成舆论，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在新闻会馆召开了有学生、工界、教育、新闻、议员、女界、绅界、政界等近千人参加的驱张大会。还先后到总统府和国务院作了7次请愿，但都无具体结果。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夏曦、彭璜、易礼容、匡日休、易克勤、熊梦飞等，还分别参加赴上海、武汉、衡阳、常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各地，开展驱张活动。何叔衡等在衡阳创办了《湘潮》杂志，彭璜等在上海出版了《湖南》、《天问》等刊物，宣传驱张。何叔衡、匡日休等还给驻防湖南的吴佩孚上了一道“请愿书”，想利用张敬尧（北洋皖系）和吴佩孚（北洋直系）之间的矛盾，促使吴佩孚“兴师讨贼”，自衡阳撤军，以便对张敬尧施加军事压力。与此同时，何叔衡等又给驻扎在郴州的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出请其出师讨张的通电，想利用张敬尧与湘军的矛盾，运动谭延闿从郴州进军，逼张出湘。1920年5月，因北洋军阀直系和皖系之间的矛盾，吴佩孚率部从衡阳北撤，在军事上不再支持张敬尧。谭延闿和赵恒惕利用驱张运动的声势和吴佩孚的北撤，率湘军从郴州北进，步步紧逼长沙。张敬尧的军队屡战屡败，望风而退。在舆论压力和军事威胁下，张敬尧于6月16日逃出长沙。6月26日，其军队全部退出湖南。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发动和领导的这场驱张运动，经过10个月的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通过这场运动，有力地揭露和打断了封建军阀，改善了湖南的政治环境。教育和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对全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也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湖南人民自治运动】 湖南人民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于1920年开展的反对军阀黑暗统治、争取人民民主权利、改造湖南社会的政治运动。

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开展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时，就同彭璜等人研究了驱张胜利后，如何实现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邀集一批新起的教育界人士，于1920年3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湖南改造促成会”。他们草拟了一份题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书稿》的材料，明确提出，应废督裁兵，民办银行、实业、废除苛捐杂税，注重教育，成立工、农、会，建立县、镇、乡自治机关，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在

上海时，毛泽东还同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问题和为此而制定的种种计划。6月28日，上海《申报》发表由毛泽东执笔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主张》的公开信。除提出“废督裁兵，建设民治”的主张外，还对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含义作了明确解释，指出：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与湖南文明之衰亡为敌者，军阀也，湘督桂巡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南征军，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民为敌，湖南人民得从容发展其本件，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湖南人自主主义也。当时驱张运动已经胜利，张敬尧被逐出湖南，湘军首领谭延闿、赵恒惕正打着“湘省自治”、“湘人治湘”的招牌统治着湖南，所以公开信又明确提出了对谭、赵的要求：（一）不引虎入室，对己人亲和将人亲之虎拒而去之；（二）往后者举，以二千万湖南人民之公意为从违；（三）度苛裁兵，钱不浪用，教育普及，保障人民自由。7月6日，长沙各界转载了这封公开信，湖南各界人士开始普遍议论自治问题。

7月7日，毛泽东由上海回到湖南，在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担任主事，继续领导湖南人民的自治运动。他针对新民学会内对自治运动或赞同，或反对的两种对立意见，阐明了自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指出：自治运动只是湖南希望在南能能够特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干这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他还阐明了解决目前具体问题的自治运动和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远大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自治运动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我虽然不反对零零碎碎，但我也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义譬如一面镜子，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归，才有所趋赴，为使运动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于1920年9月3日至10月3日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发表10篇文章，阐明了湖南人民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自治运动，批判各种错误意见，如其中的《“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就批判谭延闿的“湘人治湘”论，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是把少数特殊人物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应该是“湘人自治”，而不是“湘人治湘”。何叔衡、谭延闿在其主办的《湖南通俗报》上，也发表过许多

文章,大力宣传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如谢觉哉就在该报发表过《制定自治根本法的手续》等文章。毛泽东在宣传以广大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运动理论的同时,还积极领导“湖南改造促进会”从事实际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针对谭延闿在1920年9月13日召开官绅会议,决定由政府组织10人、省议会11人共同起草省宪法(即自治法),企图包办制定“自治法”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省学联骨干和各界进步人士为核心,以广大学生群众为基础,联合和推动教育、新闻、工商、律师和政法界人士上,共商“制宪”的具体步骤。10月4日,在长沙总商会召开各界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让谭延闿这个“革命政府”来召集“人民宪法会议”。10月5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朱剑凡、龙嘉公等377人联名在长沙各报发表《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拟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书,主张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应是“直接的、平等的、普遍的选举”产生:宪法起草与公布之权,应属于人民宪法会议;最后根据《省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会议、湖南政府,及75县的县议会、县政府,及县下最小区域之市、镇、乡自治机关,以此来反对谭延闿官办的制宪活动。10月8日,在“建议书”上签名的200多人(后来在建议书上签名的人已增加到436人,代表36个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开会,由毛泽东担任大会主席,通过了“人民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要求谭延闿政府按此要点制定人民宪法会议条例。10月10日,长沙各界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旧势力”、“解散旧省议会”、“湖南自治”和“建设新湖南”等口号,要求湖南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实现湖南真正的民主自治,并扯下湖南省议会的大门旗。扯旗事件发生后,谭延闿政府以相率驱逐,发出布告威胁市民,并把矛头对准毛泽东,说旗是毛泽东扯的,又是毛泽东在省立图书馆召集各公团开会,运动某军队,捣毁省议会,企图加害毛泽东。对此,毛泽东给警察厅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公开信,并发表在长沙《大公报》上,抗议对他进行人身迫害,要求惩办造谣诬蔑者。

谭延闿、赵恒惕政府对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压制和破坏,使毛泽东认识到改良道路行不通的。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明确指出:“政治界气已坏,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望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场自治运动,提高了湖南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要争得自身的民主权力,必须依靠自己的奋

斗;它促进了湖南各阶层人民和各种社会力量量的民主联合,树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中的威信,为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二八运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校”而开展的一场示威请愿运动,亦称“二二八运动”或“求学校运动”,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1921年开展的三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之一。从1912年开始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至1920年间到达高潮,全国各地共有160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当中有一批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到法后,便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组织革命团体,如工学界报社、劳动学会等,积极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展革命斗争。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因法国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大约有5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没找到工作,在巴黎近郊候工,靠从华法教育会的每天五法郎(合华币三角五分)“维持费”,艰难度日。华法教育会上的上层人物,如李石曾、吴稚晖等不但不能积极设法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困难,反而诬称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并时以“遣送回国”相威胁,从而引起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慨。1921年1月12日,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华法教育会是中法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交往的总机关,俭学会和勤工俭学会不过是其事业的一部分。今则混为一谈,多以为勤工俭学事务,即华法教育会的全部事业。把勤工俭学事务办理不善,尽诬罪于华法教育会。因此决定,今后华法教育会同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分立”,勤工俭学学生的一切问题,由学生自行组织事务所解决。从而把勤工俭学学生在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全部推卸不管。1月16日,又发出第二号“通告”,规定:(一)现在工厂者,自此通告发出之日起,以后如有辞工出工厂事情,本会一律不维持费;(二)勤工俭学学生在学校者,其清本会贷付学校之费用,一律结至本年二月底止,以后由该生设法自理;(三)按照学生事务部章程第十二条办法,曾经贷过正月之维持费者,应再贷与1月,至二月底止,以后概不发给;(四)不在上述二、三、项之规模,而现在仍来本会维持费者,本会概不答复。正式宣布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华法教育会的两次通告,迫使勤工俭学学生不得不团结起来,为生存、为工作、为求学而斗争。1921年1月26日,各地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在巴黎华侨协社开会,一致决议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馆、领事馆、留学监督处、华法教育会4机关迅速给候工同学找工作,继续发放“维持费”和在校

学生的“学膳费”。并要求4机关立即向国内政府请求津贴,每人每月400法郎,送人学校求学。会议还推选汪泽楷、尹宽、方敦元等6人为代表,向7机关交涉。不久,北洋政府回电驻法公使陈嘉谟,拒绝勤工俭学学生的要求,并责成陈嘉谟将无钱无工的学生分别遣送回国。至此,交涉失败。2月4日,6名代表致信全体勤工俭学学生,请各地同学推举代表,到巴黎商讨解决办法。

当时在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界社社员,在蔡和森的领导下,专门讨论了勤工俭学学生所面临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是为资本家当牛做马,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勤工”所得也不可能达到“求学”的目的。因此,他们决定发动一场学生运动,同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中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全力参加和支持巴黎近郊同学的正义要求和斗争。1921年2月21日,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李维汉、贺果、蔡畅等人部分会员和社员到达巴黎,参加并领导这场斗争。到巴黎后,他们同各地来的近百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连日举行会议,商讨讨论斗争的目的和方法,提出了争取“生存权”、“求学校”的口号,并确定了两项具体目标:第一,要求政府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入学津贴,以4年为限;第二,无条件开放在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和比利时的中比大学,接受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代表会还向全体勤工俭学学生发出宣言,指出:勤工俭学是不肯背守待毙、甘心饿死的,决定要直接行动,不达到我们的目的不止。直接行动的具体办法是:(一)即日向公使、领事下一个索的文书格式呈文(即最后通牒);(二)如到本月28日对于我们的要求还没有满意的答复,则全体向公使馆、领事馆去。2月26日,北大留法学生会、少年中国学会分会、国际和平促进会等6个法国团体,以第三者身份出面调停。公使馆拒绝接受同学的条件,调停宣告失败。2月28日,在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向警予等人的领导下,巴黎近郊的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齐集巴黎,向北洋军警政府驻法公使馆进行请愿示威。当学生队伍到达使馆门前时,法国政府早已派军严防,阻止学生进入。为避免发生流血冲突,蔡和森等11名代表进入使馆,同公使陈嘉谟谈判;其余同学则留在使馆附近的公园里,等候消息。陈嘉谟拒绝接受代表们提出的条件,但被迫同意和外出的学生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陈嘉谟到公园与学生见面后,双方发生争执,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法国军警跑来,乱打学生,将其驱散。陈嘉谟逃回使馆后,留在使馆的谈判代表仍

坚持原来的条件，不同意离开。法国警察又捕去谈判代表，并囚禁了警察局。至次日晨始全部放归。当时正在美国考察煤矿1.大罢工情况的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后赶回巴黎，撰写了2万多字的长篇报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刊登在1921年5月的大众《益世报》上，介绍了这次请愿运动的由来和发展，并揭露了驻法使馆和驻华教育会上层人物欺压迫害学生的罪行，唤起国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这次运动的影响。二二八运动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但也迫使中法当局作了某些让步，如驻法使馆和驻华教育会同意继续发表“维持费”，并答应为候工同学找工作；法团当局也组织了“少年监护会”，负责联系安排学生的劳动和生活救济。通过这次运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两大派组织——“工学界社”和“劳动学会”，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消除分歧，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

【拒款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秘密借款而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1921年开展的3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之一。1921年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铃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的代表，赴法国接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与法团秘密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财政次长吴鼎昌随行。通过秘密谈判，他们向法国政府借款1亿法郎（后增至5亿法郎），将其中的2亿存入法国人办的行将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以使其不致破产；另将其中的1亿用于购买军火，以便进行罪恶的军阀战争，借款的条件是，中国的印花税、契税由法国监理收税50年，演剧铁路的建筑权交给法国，这一借款严重出卖了国家主权。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留法勤工俭学生、华工和旅法华人的极大义愤。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和旅法华工领袖袁子贞等积极奔走，联合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东亚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等六个旅法华人团体，组成“拒款委员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拒款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是这次斗争的主力。拒款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发表了《拒款通告》，表示留法工商各界和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中法秘密借款，号召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拒款委员会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组织人力，印刷传单，分发旅法各界华人。（二）向国内各团体和美洲、南洋的华侨及留英、留德学生发出通告，呼吁共同斗争。（三）将《拒款通告》用法文印刷千余份，分送法国国会议员、国参议员、各报馆及各重要人物，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四）致信中国驻法公使陈篆，

要他对中法借款之事作明确答复。（五）直接致函吴鼎昌，向其发出警告，要他放弃借款，并离欧返国，否则决不轻饶。与此同时，拒款委员会积极筹备召开拒款大会。6月30日，各地旅法华人代表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一次“拒款大会”，周恩来、刘清扬、张君勱、李树华、赵志清等参加大会。大会主席赵志清宣布会议的宗旨是：（一）磋商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办法；（二）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三）宣布对法国的态度：非反对其国民，乃反对其少数资本家借款与中国，长中国之内乱。接着，由六团体代表李树华报告借款经过及六团体反对之情形。之后，各代表相继发言，一致反对中法秘密借款。大会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全力支持爱国运动的全程电函，并一致通过了对中法秘密借款的4项决议案。这次大会不仅鼓舞了旅法各界华人的志气，而且给中法两国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朱启铃潜逃到美国，吴鼎昌躲到英国；法国舆论界和政界的一些正直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斗争也表示同情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法秘密借款谈判被迫暂停。拒款大会的当天，周恩来写下《旅法华人拒绝借款运动》的长篇报导，寄给天津《益世报》，揭露中法秘密借款的阴谋，介绍旅法华人反对借款运动的经过情形，使国内各界了解这一爱国运动的真相，扩大了运动的影响。不久，中法双方谈判又秘密恢复。陈篆（中国驻法公使）和吴鼎昌为中方经办人。7月25日，中法借款条约秘密起草，借款总额由原来的3亿法郎增至5亿法郎。7月下旬，法国报纸透露这一消息后，立即遭到旅法各界华人的强烈反对。7月25日和29日，旅法华人各团体，先后两次向旅法各界华人和国内各团体发出《通告》，号召同胞起来反对。同时，积极筹备再开拒款大会。8月31日，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到会的有学生、华工、商人等各界代表300余人。事前，拒款委员会已通知驻法公使陈篆，要他到会交待借款真相。陈篆因害怕群众，不敢出席，便派公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作代表，到会说明情况。王曾思开始态度蛮横，责怪同胞开会拒款是“多事”，后在与群众的盛怒之下，被迫代表陈篆在会议决议上签字，保证绝不中法借款条约上签字，若以后借款仍然成立，陈篆公使及全体职员即时辞职。大会最后成立了袁子贞、徐特立、张君勱、曾鸣、谢尔发等10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以监督会议决议的执行。8月16日，陈篆亲笔补签的函件寄到拒款委员会，正式承认8月13日大会决议。在旅法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的坚决斗争下，中法秘密

借款被迫停止，历时两个月的拒款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争取里昂中法大学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而开展的争取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1921年开展的3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之一。拒款运动的胜利，触怒了法国政府。1921年9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发出通告，宣布撤销“少年监护委员会”，并从9月15日起停止发放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与此同时，一批吴稚晖从国内招收的官僚贵族子弟，也将于9月底到达里昂中法大学。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等领导下，开展了争取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法国两国政府中的反动势力和驻华教育会中的一部分官僚政客。

里昂中法大学是为解决勤工俭学生海外求学问题，由驻华教育会向国内募集经费，加上法国政府捐赠的一座旧炮台而开办的，校长吴稚晖。该校1920年3月动工，到1921年9月竣工。学校即将建成之时，吴稚晖却否认勤工俭学生与该校的关系，取消其入学资格。1920年5月30日，旅法新民主主义会向吴子贞、蔡和森、劳君展等联合其他女同学，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表致全国女界公开信，要求里昂中法大学招收女学生，并提出名额平等、免除考试、津贴学费等3项要求。这是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的先声。6月6日，王若飞等225人开会决议，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利时中法大学改建为工学院，收容勤工俭学生，并函请驻法公使馆主持赞助。此后，留法勤工俭学生便积极地进行更大的斗争。9月5日，赵世炎、李立三等在克鲁鲁勤工俭学的147名同学，发出争取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利时的《宣言》和《通告》，正式成立“克鲁鲁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取里昂比两大运动团”，并号召各地勤工俭学生成立同样团体，以期互相联络。9月6日，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200多人，在巴黎华侨协社开会，正式成立“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以蔡和森、向警予等为首的旅法新民主主义，以李维汉、李富春等为首的工学界社团和以赵世炎、李立三等为首的勤工俭学学生这一大革命团体正式成立联合起来了，从而使这个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学发出通告，认为该校是一所“高级教育机关”，“所养成的青年，在同中国的时候，定当做教授，从不下各种相当科学的研究”，因此，“对于招收与考试学生，应早考试而无经过考试”，“若

此大要历史，需要整理，整方网：http://www.51history.com